

# 談與成年子女關係對隔代教養者壓力調適之影響

鄭凱芸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 摘要

隔代教養家庭已然成為目前家庭結構的主要類型之一，現在的隔代教養者不再只是單純的托育角色，而是孫子女的代理父母。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的關係是其承擔教養角色的主要壓力來源之一，不穩定的成年子女對隔代教養家庭是一個主要的干擾因素，其影響包括：權威關係的拉扯、對親職能力的懷疑、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間關係的相互干擾、對成年子女的未竟情緒等。本文章的目的在透過壓力與調適理論架構，瞭解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對其教養過程中壓力調適之影響。研究發現，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對孫子女的未來影響甚鉅，不僅影響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關係品質，進而掌握了孫子女成長環境的優劣與身心健康。從成年子女對隔代教養的影響以及壓力與調適理論來看，實務工作者可以從下列三點協助隔代教養者執行親職工作，包括：(1) 重建權力與界線，增強教養能力與信心；(2) 協助處理隔代教養者之失落情緒；(3) 連結相關資源。未來如果能將成年子女的觀點加入隔代教養家庭議題的討論，相信主題的豐富性與創造性必會增加，也更能提供實務工作者在與隔代教養家庭工作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術。

關鍵字：隔代教養者、孫子女、成年子女、教養、壓力與調適理論



## 壹、問題陳述

隔代教養家庭已然成為目前家庭結構的主要類型之一，以美國為例，從 1990 年到現在，已經增加了 30% 的孩子與祖父母同住，2000 年就有 570 萬個祖父母與孫子女同住，其中有大約 240 萬個祖父母為其孫子女的主要照顧者（Bryson, 2001; Fuller-Thomson & Milkler, 200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00, 引自 Hayslip & Kaminski, 2005）。在台灣，隔代教養家庭也有逐年增多的趨勢，從 1994 年隔代教養家庭約佔所有家庭型態的 0.9%，增加到 2005 年的 1.3%，其中，孫子女在 18 歲以下之隔代教養家庭也從 2003 年的 0.8%，增加到 2005 年的 0.9%（見表 1，行政院主計處，2005）。由此可看出，現在的隔代教養者已不再只是單純的托育角色，而成為孫子女的代理父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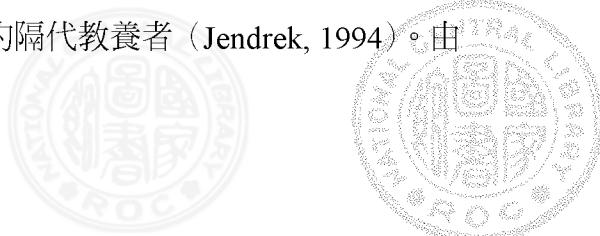
表一、全國歷年隔代教養家庭比例

年 家庭型態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隔代教 養家庭	0.9%	0.9%	1.0%	1.0%	1.0%	1.1%	1.1%	1.1%	1.3%	1.1%	1.2%	1.3%
孫子女在 18 歲以下之隔 代教養家庭	—	—	—	—	—	—	—	—	—	0.8%	0.9%	0.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05。

所謂隔代教養是指，由（外）祖父母、（外）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同輩份的長者及（外）曾祖父母負擔起照顧（外）（曾）孫子女（以下簡稱孫子女）的角色與責任。根據隔代教養者涉入的程度，照顧的型態包括：擁有監護權的隔代教養者（custodial grandparent）、沒有監護權但與孫子女同住的隔代教養者（living-with grandparent）及提供日間照顧的隔代教養者（day-care grandparent）。

擁有監護權的隔代教養者具有法律（legal）及身體上（physical）的監護；提供日間照顧的隔代教養者只負責孫子女的身體照顧，不負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與孫子女同住的隔代教養者若沒有與其成年子女同住，其功能雷同於擁有監護權的隔代教養者（Jendrek, 1994）。由



此可知，隔代教養者照顧孫子女的涉入程度（level of care-giving）與其所執行的功能有很大的關係。

國內學者則從照顧時間與涉入程度，將隔代教養者之角色分成 9 種（見表 2，梁雅舒，2003），其中長期之共同管教者、臨時性代理父母、短期代理父母及長期代理父母之祖父母角色通常屬於危機家庭之隔代教養者，他們對孫子女的照顧遠超過其成年子女，可以預測其成年子女無法承擔照顧責任之原因較為複雜與嚴重。

表二、隔代教養者之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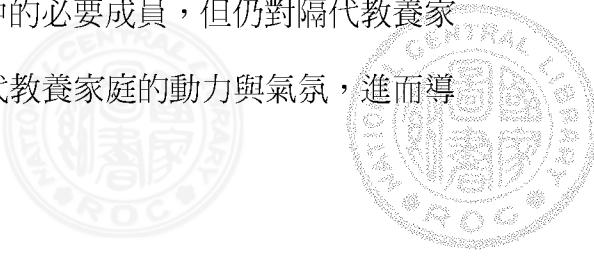
涉入程度 照顧時間	協助者	共同管教者	代理父母
臨時性	1.臨時協助者	4.臨時性共同管教者	7.臨時性代理父母
短 期	2.短期協助者	5.短期共同管教者	8.短期代理父母
長 期	3.長期協助者	6.長期共同管教者	9.長期代理父母

資料來源：“祖父母的孩子—隔代教養家庭輔導”。梁雅舒，2003，學生輔導，88，頁 35。

Tinsley & Parke(1984)指出，當隔代教養者扮演支持性的角色，例如：保母、經濟支持者、含飴弄孫等，其對孫子女產生的影響是間接的；但如果隔代教養者是孫子女的主要照顧者，執行對孫子女的教養行為，其所造成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引自 Pearson, Hunter, Ensminger & Kellam, 1990），所以，隔代教養者的教養角色、教養涉入程度與照顧時間對孫子女的各種發展有直接的關聯性。本文將著重於討論擁有監護權及沒有監護權但與孫子女同住的隔代教養者，也就是梁雅舒所提及的長期之共同管教者及代理父母的隔代教養者。

## 貳、成年子女對隔代教養之影響

隔代教養不僅重組了原有的家庭關係、重新分配了家庭資源，更改變了傳統的家庭關係，隔代教養者不再只是單純的祖父母，而是承擔孫子女主要照顧者的替代性父母。孫子女的父母（即隔代教養者之成年子女）雖然並非此家庭結構中的必要成員，但仍對隔代教養家庭影響甚鉅，而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也影響著隔代教養家庭的動力與氣氛，進而導



致隔代教養者的教養困境與孫子女的成長。由此可知，隔代教養者、成年子女與孫子女彼此間息息相關（見圖 1）。

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的關係是其承擔教養角色的主要壓力來源之一（Burton, 1992; Cox, 2003; Wohl, Lahner & Jooste, 2003, 引自 Hayslip & Kaminski, 2005），一旦承接了隔代教養的角色，隔代教養者不再是單純的祖父母，只要享受含飴弄孫的樂趣，他們必須扮演教育孫子女的角色，無論是生活、學業、醫療、未來安排，都是隔代教養者的責任。此時，不穩定的成年子女對隔代教養之教養就是一個主要的干擾因素，其影響包括：

### 一、權威關係的拉扯：

當隔代教養者承擔了照顧孫子女的角色時，代間關係開始改變（Gibson, 2005），隔代教養者取代成年子女的角色，在功能上即已扮演了訂定孫子女規矩與行為準則的人，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的關係在責任與權利上也因此出現衝突，開始一段權力爭奪（power struggle）的過程（Cox, 2003; Glass & Huneycutt, 2002; Weber & Waldrop, 2000）。其問題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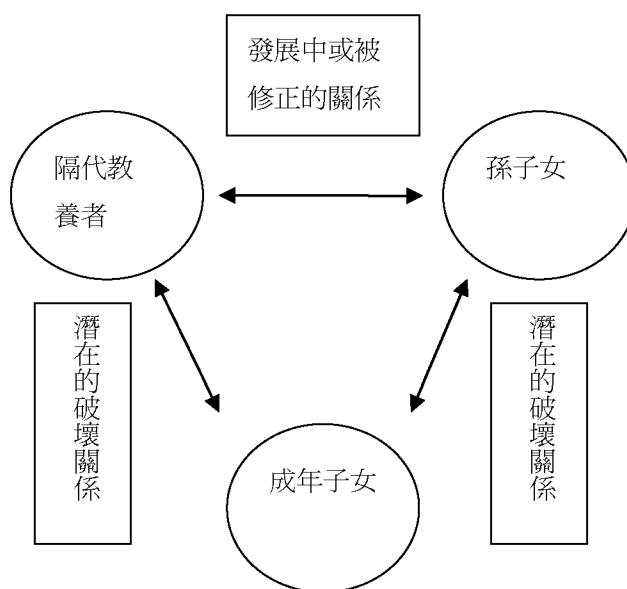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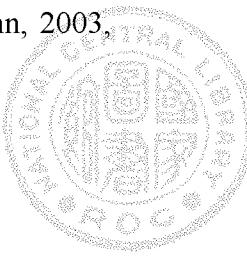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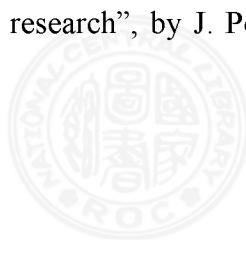


圖 1 隔代教養家庭的代間關係

資料來源：修正自“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on grandparents raising their very young grandchildren: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and research”，由 J. Poehlmann, 2003,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24(2), 152.



### (一)資源使用的爭奪：

在美國，對沒有監護權的隔代教養者來說，他們會因為身分的限制較難獲得相關資源的協助，包括：醫療服務、保險及社會安全福利等，尤其照顧身心障礙的孫子女，擁有監護權與否特別容易影響隔代教養者能否使用醫療或教育方面的資源，故隔代教養者的身分會影響資源使用的正當性（Grinstead, Leder, Jensen & Bond, 2003; Janicki et al., 2000; McCallion, Janicki, Grant-Griffin & Kolomer, 2000）。為獲得使用資源的方便性，及基於保護孫子女權益的立場，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間開始一場孫子女的監護權之爭，以保障自身與孫子女的利益。

### (二)權威競爭：

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間的權威競爭很可能模糊了隔代教養者的權威形象，折損了隔代教養者執行管教工作上的效果。雖然成年子女涉入孫子女生活的程度與期間往往是模糊的、不確定的，卻是名副其實的「隱形競爭的權威者角色」(*unseen competing authority figure*)，常常破壞隔代教養者訂下的規矩，干擾了教養孫子女的權力界線與結構，造成隔代教養者在執行親職工作的身心壓力（Gibson, 2002a; DeToledo & Brown, 1995, Poe, 1992, 引自 Glass & Huneycutt, 2002; Weber & Waldrop, 2000; Hirshorn et al., 2000, 引自 Goodman & Silverstein, 2002; Janicki, McCallion, Grant-Griffin & Kolomer, 2000）。

### (三)情緒糾結：

Burnette (1997) 曾表示，隔代教養家庭之形成主要與失功能之成年子女有很大的關係，這些成年子女所遭遇的社會或健康問題使得他們無法行使教養角色(引自 Gibson, 2002b)，而隔代教養者在這樣的情形下承接了這個教養的新角色後，即意味著將承擔長時間的教養與照顧角色，因此很容易出現憤怒與痛苦的情緒，許多愛恨的衝突情緒讓這個照顧的歷程更加複雜（Minkler & Roe, 1993, 引自 Gibson, 2002b; Kolomer, 2008）。此外，成年子女對孫子女缺乏情緒上的承諾也很容易引發隔代教養者的情緒，



但又因為不捨孫子女無人照顧或被寄養照顧，而承擔照顧的責任；加上，自己的身心狀況可能影響繼續照顧孫子女的能力（Grinstead et. al, 2002），因此，對孫子女接下來照顧問題的擔心也容易引發對成年子女的各種兩難情緒。故決定是否提供孫子女照顧就是一個與成年子女關係間動力糾結的過程，很可能消耗隔代教養者的能量，影響其執行親職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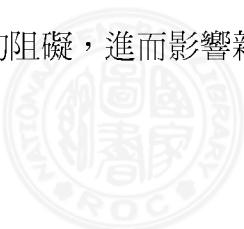
#### (四)探視權與接觸頻率：

根據 Janicki (2000: 44) 等，成年子女的探視常常是隔代教養者的困擾之一，特別是當隔代教養者認為成年子女缺乏照顧孫子女的能力，或者成年子女過去無法照顧孫子女的問題並未改善時，例如：從事藥物濫用、非法活動等(Brown-Standridge & Floyd, 2000; Giarruso et al., 2000, 引自 Cox, 2003)。隔代教養者會擔心成年子女與孫子女間定期或不定期的互動與接觸，對孫子女造成不良的影響或示範。有時會有強烈的舉動，禁止成年子女探視孫子女，如此一來，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的衝突可能完全浮上檯面，家庭關係瞬間瓦解（Cox, 2003）。

在主流的家庭結構中，親子與隔代次系統的界線清楚，權力與責任的劃分也都根基於家庭角色與功能，然而，隔代教養家庭中成年子女的缺席改變了整個家庭的結構，隔代教養者擔負了主要照顧者的角色，此時，不論成年子女問題的類型，他們在情緒上都會影響隔代教養家庭動力，與隔代教養者形成一種微妙的權力拉扯。

## 二、對親職能力的懷疑：

通常隔代教養者會將照顧孫子女當成自己失敗或其成年子女失敗的指標（邱珍琬，2002；Brown-Standridge & Floyd, 2000; Cox, 2003; Glass & Huneycutt, 2002; Hayslip & Kaminski, 2005），認為自己已無力教養好自己的成年子女，又如何能給予自己的孫子女好的教育或示範？對自己親職能力的懷疑往往與其成年子女的問題有很大的關係，一旦對成年子女的問題感到羞愧或憤怒，隔代教養者往往會隱藏成年子女無法扮演照顧角色的原因，並將之視為保護孫子女的方法，但也因此造成與孫子女溝通上的阻礙，進而影響親職角色的扮演。



及與孫子女的關係（Cox,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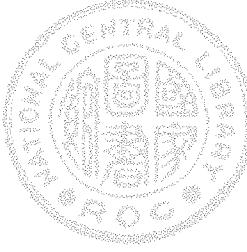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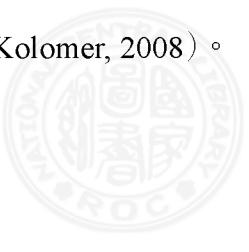
### 三、關係的相互干擾：

子女本應由父母教養，若由祖父母來教養，理論上祖父母是關係的干擾者。但隔代教養則把教養者移轉至成年子女的父母，此時的成年子女卻成了祖孫關係的干擾者，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互相干擾的必然現象。成年子女或許在形體上（physically）並非隔代教養家庭結構的組成份子，但其在情緒上對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影響都非常大（Weber & Waldrop, 2000），不僅消弱隔代教養者執行親職功能的信心，同時也干擾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關係。另一方面，有研究顯示，當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共同擔負教養孫子女的角色時，過度干預成年子女的親權，很可能惡化了成年子女的親職能力（Wakschlag et al., 1996，引自 Goodman & Silverstein, 2002），使其無法適當地發展親職技巧，與孫子女培養親子關係，間接地造成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間關係的競爭與緊張。關係彼此干擾的狀況下，更可能危害到其他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影響家庭的凝聚與支持。

### 四、對成年子女的未竟情緒：

不同理由造成成年子女的缺席，會對隔代教養家庭產生不同的家庭動力（Brown-Standridge & Floyd, 2000; Jendrek, 1994）。研究指出，有將近三分之二擁有監護權的隔代教養者對其成年子女感到失望，近三分之一表達對成年子女的憤怒，其他則認為被其成年子女利用（Shore & Hayslip, 1994，引自 Hayslip & Kaminski, 2005）。

此外，成年子女問題的類型會影響隔代教養者的因應態度與情緒，例如：如果成年子女因故死亡，隔代教養者不僅要解決本身因失落而產生的種種情緒，還要協助孫子女處理父母死亡產生的失落與悲傷；如果成年子女因為藥物或酒精濫用、服刑、離婚、兒虐等原因而無法繼續照顧孫子女，隔代教養者不但會對成年子女產生憤怒、害怕、自責、丟臉、失望、被叛等的情緒，還有可能因為擔心成年子女與其爭奪孫子女的監護權而產生不安全感（Brown-Standridge & Floyd, 2000; Glass & Huneycutt, 2002; Gibson, 2002a; Morrow-Kondos, 1993，引自 Grinstead et al., 2002; Hayslip & Kaminski, 2005; Kolomer, 2008）。



不論是何種未竟情緒，都是一種失落，生命延續的失落、好父母形象的失落、操控感的失落、自我價值的失落。這些失落很可能會延續好長一陣子，多多少少減弱隔代教養者親職能力的展現，或者因為這些失落情緒而忽略對孫子女的照顧，甚至將這些情緒投射到孫子女身上，所以，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直接衝擊到其與孫子女的關係。

如同許多研究所證明的，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對整個家庭的影響深遠，不僅衝擊隔代教養者的生活與角色調適，更造成隔代教養者執行教養角色的困難，進而影響其與孫子女的關係，及孫子女各個層面的問題，最後，甚至決定了隔代教養者壓力調適策略之選擇。壓力與調適理論說明了一個人對事件的知覺決定了此一事件的意義—此一事件是否成為壓力源。故本研究的目的即在透過壓力與調適理論（stress and coping theory），瞭解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對其教養過程中壓力調適之影響。

## 參、隔代教養的相關議題

從 1990 年代開始，關於隔代教養家庭的研究已逐漸豐富，不僅讓我們瞭解到隔代教養家庭的特質與限制，同時在文化與種族的主題上也做了許多的討論，相關議題如下：

### 一、隔代教養家庭之間題與困境：

許多文獻都證實了隔代教養家庭會面臨許多的問題與困境（Bowers & Myers, 1999; Burnette, 1997; Burton & Dilworth-Anderson, 1991; Burton, Dilworth-Anderson & Merriwether-deVries, 1995; Fitzpatrick & Reeve, 2003; Fuller-Thomson, Minkler & Driver, 1997; Gibson, 2002a, 2002b; Glass & Huneycutt, 2002; Grinstead et al., 2003; Jendrek, 1994; Kropf & Burnette, 2003; Weber & Waldrop, 2000），不論是從祖父母的角色或生命週期的發展階段來看，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父母都有執行親職教育與本身適應上的困難與限制，分述如下：

#### (一)時間失序的角色問題：

當一個人不同的社會面向與角色組同時發生時，「時間失序的角色」（time-disordered roles）就產生了（Seltzer, 1976, 引自 Jendrek, 1994）。對擁有監護權



或與孫子女同住的祖父母而言，其所承擔的照顧及教養責任與其生命週期的角色常規不一致，容易出現角色衝突（Landry-Meyer, 1999），這種非預期的（off-time）教養角色常常阻礙了祖父母發展任務的完成，沒有足夠的時間滿足自身的需求，對祖父母的社會支持也產生負面的影響（Burton et al., 1995; Gibson, 2002b; Kolomer, 2008; Kropf & Burnette, 2003）。在隔代教養家庭中，單純的祖父母角色消失，他們取代了失功能父母的親權，角色顛倒（role reversal）於焉產生（Gibson, 2002b），他們不再只是扮演支持角色的祖父母，他們是承擔更多孫子女責任的主要照顧者。新的角色與責任帶來新的自我認同，同時也不斷提醒著祖父母其缺席成年子女的問題，引發如憤怒或怨恨的情緒（Gibson, 2002b）。故時間失序的角色不僅影響了祖父母生命週期任務的執行，也伴隨了其他的情緒問題。

## (二)家庭結構與教養問題：

對沒有監護權卻與孫子女同住的祖父母來說，其缺乏法律賦予的合法性來執行親權，特別容易導致祖父母角色的模糊（role ambiguity），造成隔代教養上的困難（張耐，2002；Gibson, 2002a; Kropf & Burnette, 2003）。即便是擁有監護權的祖父母，仍可能因為角色轉換上的困難無法樹立權威形象，形成代間界線的模糊，在教養孫子女上出現困境。另外，失功能的成年子女並不會因為缺席而減少對孫子女的影響，這些影響都很可能干擾祖孫間的關係，進而影響教養的效果（陳貞妃，2002；Weber & Waldrop, 2000）。

## (三)身心健康問題：

非預期的主要照顧者角色對祖父母造成極大的身心壓力。許多研究已經顯示，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父母常面臨身體與心理方面的問題，教養的負擔與身心壓力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焦慮與沮喪常常是他們的主述問題（Grinstead et al., 2002; Kelley, Yorker, Whitley & Sipe, 2001; Kropf & Burnette, 2003）。龐大的教養責任很容易惡化祖父母的身心健康（Fitzpatrick & Reeve, 2003; Kolomer, 2008），尤其在他們體力明顯衰退的生命



週期，進而限制了他們與孫子女的互動（Smithgall, Mason, Michels, LiCalsi & Goerge, 2009）故年齡是影響祖父母身心健康很重要的因素（Kelley et al., 2001），特別是祖父母常常會擔心自己的死亡而無法繼續照顧孫子女，及孫子女接下來的照顧問題（Grinstead et al., 2002; Kolomer, 2008）。

#### (四)社交孤立問題：

沉重的照顧與教養對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父母社交生活影響很大，大大地侷限了祖父母的社會關係（邱珍琬，2002；Fitzpatrick & Reeve, 2003; Gibson, 2002a; Grinstead et al., 2002; Kelley et al., 2001; Kolomer, 2008; Kropf & Burnette, 2003）。他們常常因為要分配時間照顧孫子女，而與同儕團體疏離，有限的社會支持網絡很容易耗竭他們的身心精力。有研究指出，在隔代教養家庭中，擁有同儕支持的祖父母會比沒有同儕支持的祖父母更正向地看待他們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同時不會感到孤立感或隔離感（Burton & Sorensen, 1993，引自 Burton et al., 1995）。然而，大部分隔代教養家庭中的祖父母因為照顧與教養工作的分身乏術，加上身心壓力的負擔，常常感到社交孤立與支持網絡的匱乏。

#### (五)資源問題：

經濟與其他資源的不可近性是隔代教養家庭中祖父母的另一個壓力源，這些身為孫子女主要照顧者的祖父母很可能沒有保險、需要停止工作、或減少工作時數來照顧孫子女，尤其對沒有監護權的祖父母而言，他們會更有困難獲得相關的資源協助，例如：醫療服務、保險及社會安全福利等（陳麗欣、翁福元、許維素、林志忠，2000；Grinstead et al., 2002; Joslin, 2009; Kolomer, 2008）。從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看，這些祖父母很可能因為退休而減少收入，然而照顧孫子女卻可能需要更多的經濟花費（Fitzpatrick & Reeve, 2003; Kelley et al., 2001; Kolomer, 2008），如此更容易陷入經濟的窘困。除了照顧孫子女的額外經濟負擔外，這些祖父母也缺乏其他的服務來幫助他們曾經受創的孫子女，例如：諮詢師、治療師等（Smithgall et al., 2009）。另外，許多



祖父母也需要喘息性服務來緩解照顧孫子女的壓力 (Fitzpatrick & Reeve, 2003)。由此可知，資源的缺乏與祖父母的身心壓力有相當的關係。

#### (六)法律問題：

法律上的協助常常是隔代教養家庭中的重要需求，最常遇到的法律問題往往與祖父母和孫子女間的法律關係有關。沒有監護權的祖父母很可能無法享有孩子的醫療照顧福利、學校註冊等權利，祖孫間的關係也充滿了不確定性，祖父母無法避免失功能的成年子女與其爭奪孫子女的照顧權利 (Fitzpatrick & Reeve, 2003; Kelley et al., 2001; Kolomer, 2008)。

### 二、隔代教養的文化與種族因素探討：

在某些種族、文化中，隔代教養是家庭的傳統結構。以非裔美人為例，祖父母被視為是擴展家庭的保存者、孫子女的保護者、文化傳承的領導者，在教養孫子女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國及台灣原住民、波多黎各、墨西哥家庭的祖父母在教養孫子女上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Burton et al., 1995; Burton & Dilworth-Anderson, 1991; Hunter, 1997; Simpson, 2008)。然而，近三十年來，隔代教養家庭已經超越種族，並非只是非裔美人專屬的家庭型態(Jendrek, 1994)，其成因與社會及健康問題密切相關，且隔代教養者不再只是輔助照顧的角色，而是承擔了孫子女主要照顧者的功能。

在 Pruchno(1999)及 Burnette(1999)的研究中發現，相較於白人，非裔美人及拉丁美人的隔代教養者通常與家人或其他的成年子女(非孫子女的父母)同住，在教養過程中得到的支持較多(引自 Hayslip & Kaminski, 2005)，已有研究證實，拉丁美人的隔代教養者之健康與具有高度支持的家庭結構密切相關(Hayslip & Kaminski, 2005)。由此可看出，代間協助與家庭傳承的文化仍影響不同種族間隔代教養家庭的結構。

承擔隔代教養角色的原因也反應在種族差異上，白人通常是因為成年子女的失功能，而非裔美人則是因為成年子女失業及青少年未婚懷孕而扮演孫子女的主要照顧者 (Pebley & Rudkin, 1999, 引自 Hayslip & Kaminski, 2005)。在台灣，因傳統的三代同堂家庭，隔代教養



者承擔教養角色有更多元的討論空間，加上近年來家庭結構急速重組，呈現了更加多元的面貌。此外，國外的研究中顯示，承擔隔代教養的多為母系的祖父母，相反地，在台灣多半是父系的祖父母（紀妙幸，2003）。

整體而言，種族文化因素會造成隔代教養者的高度異質性，瞭解隔代教養者的種族文化背景，可提高區辨其需求與困境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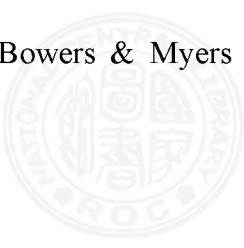
### 三、家庭因素探討：

家庭支持一直是預測主要照顧者負擔與身心壓力的重要指標(Butler, Turner, Kaye, Ruffin & Downey, 2005)，而影響隔代教養家庭成員關係與適應的因素非常多，其中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的關係是影響隔代教養家庭的關鍵，而左右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關係的主要因素為成年子女的問題類型(Lightfoot & Rotheram-Borus, 2004; Minkler, Roe & Price, 1992)。另外，也有許多研究證實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關係和成年子女息息相關(Hayslip & Kaminski, 2005; Sands, Goldberg-Glen & Thornton, 2005)。因此，隔代教養者成年子女的問題對隔代教養者執行親職能力及生活適應有絕對的影響，不僅影響彼此間的關係，同時對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關係影響甚巨。

至於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孫子女，隔代教養者的身心壓力與挑戰更大。許多研究都指出，孫子女的身心問題容易惡化隔代教養者的教養壓力，影響隔代教養者的身心健康(Bowers & Myers, 1999; Burnette, 2000; Hayslip & Kaminski, 2005)。尤其身心障礙的孫子女對資源的需求較高，隔代教養者都必須協助連結相關資源，照顧的涉入程度與要求相對地提高，因此照顧身心障礙的孫子女比照顧正常發展的孫子女來的辛苦。孫子女的健康或行為問題愈嚴重，隔代教養者的情緒壓力就愈大，進而影響祖孫關係的品質(Force, Botsford, Pisano & Holbert, 2000; Grant, 2000; Janicki et al., 2000)。

### 四、角色因素探討：

隔代教養家庭的形成與無法照顧孫子女的失功能成年子女有關，而隔代教養者提供照顧的類型也與成年子女的失功能有關。在 Jendrek (1994) 與 Bowers & Myers (1999) 的研究



中說明了隔代教養者提供照顧的型態與其成年子女問題之間的關聯性，例如：擁有監護權或與孫子女同住的隔代教養者因其成年子女的嚴重行爲或功能性問題，而承擔照顧孫子女的責任；提供日間照顧的隔代教養者則是扮演成年子女日常生活中的支援性角色（Jendrek, 1994）。在隔代教養家庭中，單純的祖父母角色消失，他們取代了失功能成年子女的親權，角色顛倒（role reversal）於焉產生（Gibson, 2002a），他們不再只是扮演支持性角色的祖父母，他們是承擔更多孫子女責任的主要照顧者。

隔代教養者提供照顧的類型與其照顧涉入程度也決定了隔代教養者的親職壓力，通常全職的隔代教養者較提供日間照顧的隔代教養者承擔更多的壓力，同時生活滿意度較低（Bowers & Myers, 1999）。此外，社會孤立是隔代教養者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與親職角色的負擔及非預期的角色有很大的關係（Hayslip & Kaminski, 2005）。當隔代教養者的人際互動愈受限，社會支持愈無法進入，社會隔離的問題就愈嚴重，社會孤立的問題就會繼續惡性循環。

#### 肆、影響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關係之因素：

根據 Burton & Dilworth-Anderson (1991) 的研究指出，成年子女無法照顧孫子女的原因決定了隔代教養者對成年子女的態度，因而也影響了兩者之間的關係（Lightfoot & Rotheram-Borus, 2004; Minkler et al., 1992）。有三個主要因素影響兩者之關係甚巨：

##### 一、成年子女問題的類型：

成年子女的問題類型決定了隔代教養者對成年子女的態度（Lightfoot & Rotheram-Borus, 2004; Minkler et al., 1992），例如：隔代教養者對有藥癮問題的成年子女與因爲工作需要而無法照顧孫子女的成年子女，會有不同的情緒與態度反應。故成年子女的問題類型，也大大影響了他們與隔代教養者的關係。比較國內外研究發現，隔代教養者承擔教養角色的原因多爲成年子女離婚、未婚懷孕、喪偶等因素，但國外隔代教養者之成年子女藥物濫用、服刑與罹患 AIDS 的狀況明顯多於國內（紀妙幸，2003）。成年子女問題的類型大致有下列幾種：



### (一) 偏差行爲型：

偏差行爲愈嚴重，隔代教養者的意願愈勉強，負面的情緒亦較強，兩者之間的關係不言可喻。Casper & Bryson (1998) 的研究顯示，成年子女的藥物濫用與受刑入獄是隔代教養者承擔照顧孫子女責任的最主要原因（引自 Gibson, 2005），酒精濫用亦是隔代教養者扮演孫子女主要照顧者的重要因素 (Goodman & Silverstein, 2002)。偏差行爲型的成年子女往往因為服刑而無法照顧孫子女，其偏差行爲的復發，更容易導致隔代教養者的負面情緒，認為成年子女不負責任。加上隔代教養者的新角色與身分不斷提醒著其缺席成年子女的偏差問題，更容易讓隔代教養者的自我形象受損，因而產生對成年子女如憤怒或怨恨等的情緒 (Gibson, 2002b)。

### (二) 肅偶或健康因素型：

指成年子女因為生病、身心障礙（包括情緒或精神問題）或喪偶單親等因素，無力照顧孫子女者，此一類型的成年子女亦是形成隔代教養家庭結構的因素之一（邱珍琬，2005；蘇嘉芸，2006；Gibson, 2002b; Gibson, 2005; Grinstead et al., 2003; Poelmann, 2003）。無論是喪偶或健康因素無法扮演父母角色，都可視為「被迫」的選擇，不是他們不願意，而是他們「不行」，對隔代教養而言，這類問題並未涉及成年子女的德行問題，他們較容易保有完整的自我形象與自我價值，甚至可將自己的「鼎力相助」視為一種恩惠或奉獻，給予自我肯定。而健康因素中罹患 AIDS 則是例外，可能與成年子女的個人行為有很大的關係，這種家庭創傷事件對家庭關係的影響非常大。一般來說，此類成年子女的父母（即隔代教養者）擁有孫子女的監護權，代替成年子女執行教養孫子女的親權（Pebbley & Rudkin, 1999, 引自 Hayslip & Kaminski, 2005）。

### (三) 經濟因素型：

成年子女失業或其他非上述因素導致的經濟困窘亦是隔代教養者承擔教養責任的原因 (Gibson, 2005; Grinstead et al., 2003)。此類問題的成年子女往往與隔代教養者同住 (co-resident)，與隔代教養者共同教養 (co-parenting) 孫子女，倚賴隔代教養者經



濟上與照顧人力上的協助 (Hayslip & Kaminski, 2005)，隔代教養者不一定擁有孫子女的監護權，也可能僅提供日間照顧，暫時緩衝成年子女經濟上的困境。

#### (四)情境因素型：

成年子女也可能因為未婚懷孕、離婚、工作或完成學業及死亡等因素而無法承擔照顧孫子女的責任 (Gibson, 2005; Grinstead et al., 2002)，其中，成年子女的死亡帶給隔代教養者許多額外的任務與負擔，包括：自己與孫子女悲傷情緒的處理 (Gibson, 2002a; Grinstead et al., 2002)，特別是當成年子女的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意外地、非預期地接手照顧孫子女，常常承擔更多的壓力與負擔，也要花更多的時間調適角色與生活軌道的改變，此時，悲傷與失落的議題更複雜了整個隔代教養的過程。

由上述可得知，成年子女問題的嚴重性、污名化的程度，會影響隔代教養者對成年子女的態度，故成年子女無法照顧孫子女的問題類型影響了他們與隔代教養者的關係。

### 二、孫子女的身心狀況：

有藥癮或酒癮問題的成年子女很可能造成孫子女先天上的身心問題，產生教育、醫療或社會服務上的特殊需要 (Burton, 1992; Janicki et al., 2000)，而有特殊需求的孫子女較容易帶給隔代教養者額外的負擔與挑戰 (Cox, 2003; Hayslip & Kaminski, 2005)，此時，隔代教養者很容易將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孫子女所承擔的身心壓力投射到成年子女身上，認為成年子女要為孫子女的健康負責，而對成年子女產生種種的情緒，出現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間的緊張與衝突關係。

### 三、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過去的關係：

隔代教養者如何看待照顧孫子女所產生的壓力，與其和成年子女過去的關係息息相關 (Sands & Goldberg-Glenn, 2000, 引自 Sands et al., 2005)。關係愈薄弱，隔代教養的情義意願或義務代勞的強度勢必減弱，反之，隔代教養者義不容辭的概念一定愈強 (Rossi & Rossi, 1990; Whitbeck, Simons & Conger, 1991, 引自 Whitbeck, Hoyt & Huck, 1993)。隔代教養者與其子女過去的親子關係不佳時，當子女出現問題行為時，更容易惡化彼此之間的關係，甚至將教養



孫子女的身心壓力與各種問題所產生的情緒移轉到成年子女身上。另有研究指出，祖父母與父母的關係品質直接影響祖孫關係 (Barranti, 1985, Brubaker, 1990, 引自 Whitbeck et al., 1993)，所以，當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的關係是衝突或緊張時，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關係也會出現問題，進而加重隔代教養者的親職壓力。

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決定了隔代教養者照顧孫子女的困難度 (Bowers & Myers, 1999)，也影響了隔代教養者如何知覺成年子女的問題，進而影響了隔代教養者的壓力調適。

## 伍、壓力與調適理論

許多學者提出有關壓力與調適的理論，不論是 Hill (1949, 1958) 的 ABCX 家庭危機模式、McCubbin & Patterson (1983) 的 Double ABCX 模式，或者 Lazarus & Folkman (1984) 的壓力與適應理論，都強調知覺、資源與調適(因應)的重要 (Chadiha, Adams, Biegel, Auslander & Gutierrez, 2004; Sands et al., 2005)。壓力與調適理論將壓力視為一個由許多因素交互作用而產生的過程 (Kang, 2006)，單純事件是否會成為壓力源則受到過程中的因素互動所影響，以下將有關壓力與調適理論的重要概念略做敘述：

### 一、事件：

突發的危機事件或生命週期的轉變 (transition) 都可能成為壓力源，故任何一事件威脅到一個人健康及功能的有問題或具有挑戰性的狀況、經驗及活動，都可能成為壓力源 (Chadiha et al., 2004)。

成年子女的問題類型為影響其與隔代教養者關係的事件：

隔代教養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可能成為隔代教養者所面臨的壓力源，而這些問題與其成年子女息息相關。通常隔代教養者涉入的照顧程度愈高，例如：擁有監護權或與孫子女同住的隔代教養者（有些研究以孫子女的全職照顧者做說明），可能表示其成年子女的問題較提供孫子女日間照顧的隔代教養者（或者孫子女的兼職照顧者）之成年子女問題嚴重，故此事件成為壓力源的機會也較大 (Bowers & Myers, 1999; Jendrek, 1994;)。如前所述，成年子女的問



題造成其無法扮演父母角色的原因，會影響隔代教養者對成年子女的態度或情緒反應，進而影響他們之間的關係，所以，成年子女的酒癮或藥癮問題可能比成年子女因意外死亡而無法照顧孫子女更容易成為隔代教養者的壓力源。

已有研究發現，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關係愈緊張與衝突，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關係亦愈惡質 (Bowers & Myers, 1999)。特別是當成年子女的問題直接影響孫子女的身心健康時，更容易惡化與隔代教養者間的關係，故隔代教養者承擔照顧孫子女角色的原因是影響與成年子女關係是否由單一事件變成壓力源的重要因素。

## 二、知覺：

即一個人對經驗或事件的評價 (appraisal) 或詮釋的意義為正向或負向 (Chadiha et al., 2004; Sands et al., 2005)，不同的人對同樣的情境或經驗會有不同的解釋與感受。評價過程分成二個階段，一為初級評價，即個人判斷在此事件下可能的代價或風險；一為次級評價，即經過判斷後所選擇的因應策略 (Lazarus & Folkman, 1984, 引自宋麗玉，2002)。

### 隔代教養者對成年子女問題的詮釋：

在壓力與調適理論中，個人的知覺或評價決定了壓力源是否造成威脅 (Sands et al., 2005)。因此，隔代教養者如何知覺與評價成年子女的問題影響著他們之間的關係；同樣地，隔代教養者的知覺也受到其與成年子女間關係的影響 (Sands et al., 2005)。評價和隔代教養者對壓力源的接受與否有關 (Bowers & Myers, 1999)，如果隔代教養者視成年子女的問題為負向的、丟臉的、自己失敗的指標、不負責任的，他們愈不可能接受成年子女，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就愈緊張與不良。相反地，如果隔代教養者能夠將成年子女的問題視為不可抗拒的、可原諒的、不得已的，他們就比較能接受成年子女，彼此的關係也會較佳，隔代教養者較不容易感到壓力 (Pruchno & McKenney, 2000, 引自 Hayslip & Kaminski, 2005)。所以，如果成年子女因為死亡、身心障礙、精神疾病等問題而無法承擔照顧孫子女的責任，會比吸毒或酒癮的成年子女來的被隔代教養者接受，前者與隔代教養者的關係也會比較好。

從上述可發現，其中評價的重點是成年子女的問題是否有社會烙印或標籤的議題存在，



社會對意外死亡與感染 AIDS 死亡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由此可知，隔代教養者如何評價成年子女的問題與社會規範有很大的關係，當然，也可能與隔代教養者本身的價值架構有關。當隔代教養者能夠正向地解讀成年子女的問題時，他們也較能夠發展出對隔代教養角色的正向意義，包括：他們是有價值的與有貢獻力的、生命的延續者、與孫子女發展緊密的關係、個人的成長等 (Gibson, 2002a; Hayslip & Kaminski, 2005; Kivnick, 1982; Weber & Waldrop, 2000)。

### 三、資源與因應策略：

即個人用來反應壓力源的有形或無形的支持，猶如壓力的緩衝劑 (Chadiha et al., 2004)，也就是說，因應是由於壓力或壓力源而產生的認知或行為層面的調適，包括：社區的外在資源與個人的內在資源，可滿足個人的需要，並協助處理及面對生活中的各種要求 (Sands et al., 2005)。因應的功能有二，第一為改變功能，即個人改變壓力或危機情境；第二為管理功能，即個人控制或管理思想、情緒或行為反應。個體藉由因應，可降低或消除壓力帶來的身心傷害。

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因應策略類型，Lazarus & Folkman (1980) 將因應策略分成問題解決取向與情緒取向；Cohen (1986) 將因應策略分為直接行動、行動壓抑、尋找資源、運用內在心力防衛機轉、尋求他人支持等 (引自吳秀楨, 1991)；Folkman, Lazarus, Dunkel-Schetter, Delongis & Gruen (1986) 則將因應策略歸為八大類，包括：對抗的因應、疏遠的因應、自我控制、尋求社會支持、接受責任、逃避、有計畫的解決問題與正向再評價等。

### 面對成年子女問題的資源與因應策略：

資源與因應策略可緩解壓力，可幫助隔代教養者改善與成年子女的關係。資源指的是經濟資源、教育與社會支持等；因應策略則為問題解決的技巧、修正隔代教養者知覺成年子女問題的意義、與尋求社會支持的能力等 (Bowers & Myers, 1999)。當隔代教養者擁有愈多的資源與有效的因應策略，其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就愈正向與健康。

資源又可分為內部與外部資源，內部資源（含情緒與實物資源）即家庭給予的非正式支



持，可創造家庭本身的復原力，使隔代教養者有能力容忍、甚至從不利的環境中獲得力量（Sands et al., 2005）。由此可知，隔代教養者或許無法從有問題的成年子女（即孫子女的父母）身上獲得支持與幫助，但其他的成年子女卻可能是其面對無法擔負照顧孫子女責任的成年子女時最重要的支持與支援，可提供隔代教養者情緒上、經濟上或照顧人力上的幫助（Simpson, 2008; Weber & Waldrop, 2000）。外部資源指的是家庭系統外的支持，包括：心理諮詢、健康保險、兒童托育、喘息服務或經濟補助等（AARP, 1993, Takas, 1995, de Toledo & Brown, 1995, 引自 Sands et al., 2005），透過外部資源以減緩隔代教養者照顧孫子女的身心壓力之餘，也可能因此緩解隔代教養者與其成年子女間緊張、衝突的微妙關係。相反地，如果資源缺乏可獲得性、可近性或適切性，在支持系統不足的情況下，隔代教養者的照顧負擔加重，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也可能因此出現困難。

個人如何使用資源即為因應壓力的策略，例如：個人的因應策略有獨處、禱告（宗教）、冥想、運動、逛街等（Glass & Huneycutt, 2002; Kang, 2006），或者尋求專業的協助，像諮詢、藥物治療等；此外，喝酒、藥物濫用也是一種因應策略（Kang, 2006），屬於逃避型的因應方式，往往導致更大的心理壓力（Bass et al., 1996, 引自 Musil, 2000）。故不同的因應策略對緩解壓力源有不同的效果，有些因應技巧能夠有效緩衝壓力源的影響，有些不但無法減緩壓力源，反而惡化了壓力源的嚴重性，壓力源發展成壓力事件。

#### 四、壓力源：

經過個人的知覺與資源間的交互作用，決定事件最後是否成為壓力源。

成年子女問題對隔代教養者與其關係的影響與結果：

隔代教養者涉入孫子女的照顧程度愈高，或者孫子女的身心問題愈嚴重，隔代教養者的照顧壓力就愈大（Bowers & Myers, 1999）。如前所述，隔代教養者成為孫子女主要照顧者的原因與其成年子女的問題有很大的關係，往往擁有監護權或與孫子女同住的隔代教養者的成年子女之間具有社會烙印；再者，大部分孫子女的身心障礙與成年子女的問題也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孫子女的身心或功能障礙與成年子女有直接的關聯性。由此可知，由隔代教



養者的照顧形式以及孫子女的障礙程度可預測其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再透過隔代教養者對事件的知覺與資源多寡的交互作用，決定了成年子女的問題是否影響其與隔代教養者間的關係，進而成爲隔代教養者的壓力源。

因此，壓力與調適理論強調個人與環境面的相互影響，事件本身無法決定是否成爲壓力源，端看個人的知覺評價與資源間的交互作用來決定。這個理論特別重視個人對事件的知覺，也就是說，人並非單純地透過刺激做反應，而是經過認知的判斷後，決定要如何對刺激做出回應。以下從上述的主要概念：壓力源、知覺、資源與因應策略、結果，呈現壓力與調適理論如何運用在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關係上（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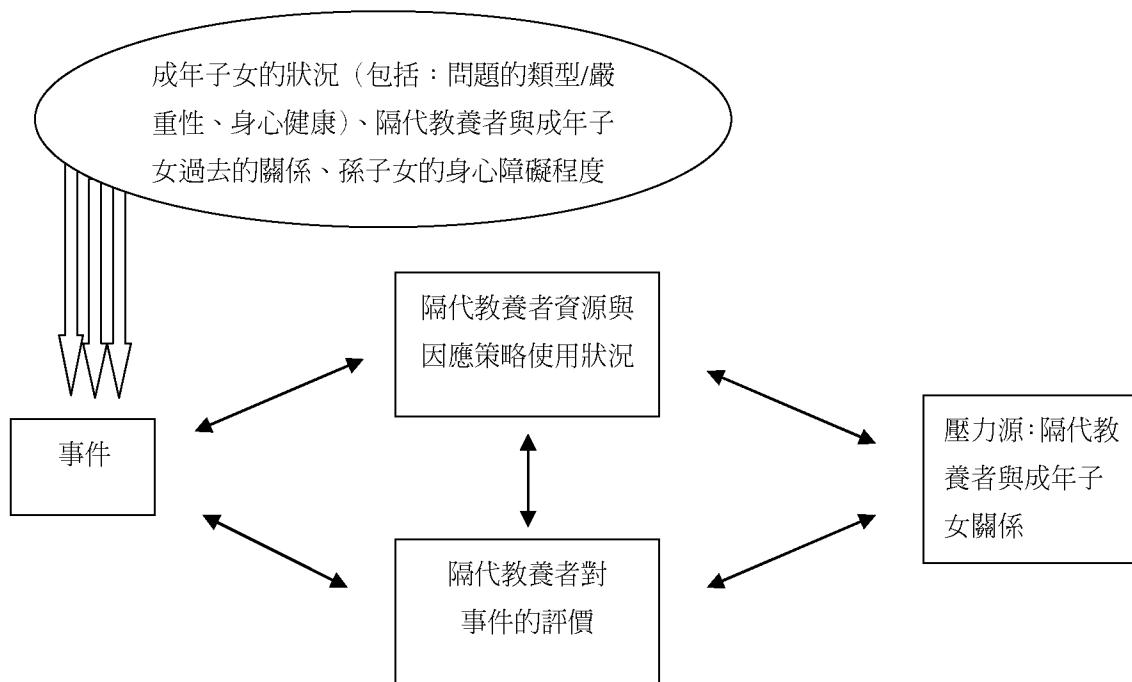


圖 2 運用壓力與調適理論在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關係上

## 陸、實務工作的考量

從壓力與調適理論中，我們清楚看到影響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不僅影響隔代教養者本身的壓力調適，更直接影響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關係，而祖孫關係的好壞掌握了孫子女成長環境的優劣與身心健康（Glass & Huneycutt, 2002; Grant, 2000），因此，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對孫子女的未來影響甚鉅。



從成年子女對隔代教養的影響以及壓力與調適理論來看，實務工作者可從下列三點協助隔代教養者執行親職工作：

### **一、重建權力與界線，增強教養能力與信心：**

藉由親職知識與技巧的傳遞，重新建立隔代教養者的教養權威，提升自信與能力，避免因為成年子女的介入、競爭或缺乏親職技巧而模糊其權威形象，建立祖孫間清楚的權力關係。

### **二、協助處理隔代教養者之失落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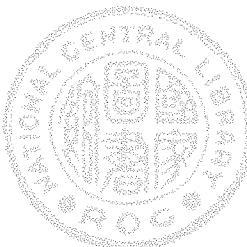
透過專業的介入，協助隔代教養者處理、治療因成年子女問題而產生的各種失落情緒，以調整隔代教養者對成年子女的知覺與評價，並進而習得幫助孫子女面對成年子女缺席而形成的種種情緒，發展適當的因應策略，穩定祖孫關係。

### **三、連結相關資源：**

透過各種資源的投入，健全隔代教養家庭的支持網絡，緩衝成年子女問題對隔代教養家庭的傷害，尤其強化家庭系統中其他成員與隔代教養者間的關係，以補足隔代教養家庭經濟、人力、情緒支持上的不足。

## **柒、結論**

隔代教養者與成年子女的關係決定了孫子女的身心發展，隔代教養家庭逐年增加，協助隔代教養者改善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並協助其發展適當的壓力調適策略與親職技巧，是實務工作者首當其衝的任務。整理國內外目前多數的研究重點都聚焦在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身心健康，對成年子女的關注似乎較少，然而，成年子女是隔代教養家庭中的重要影響因子，不僅影響隔代教養者與孫子女的關係，對隔代教養者本身的身心健康更是最直接的衝擊。此篇文章從隔代教養者的角度，來看其與成年子女關係的內涵與影響，未來如果能將成年子女的觀點加入隔代教養家庭議題的討論，並考慮隔代教養者的人口變項，相信主題的豐富性與創造性必會增加，也更能提供實務工作者在處遇隔代教養家庭上的技術。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參考書目

行政院主計處（2005）。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吳秀楨（1991）。家庭對精神分裂病患主要問題的因應方式之探討。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工作組碩士論文。台北：東吳大學。

宋麗玉（2002）。精神病患照顧者負荷量表之發展與驗證－以實務應用為取向。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6(1)，61-100。

邱珍琬（2002）。隔代教養祖孫需求初探。嘉義大學九十一學年度師範院校學術論文發表論文集，2057-2085。

邱珍琬（2005）。隔代教養經驗－敘事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人文藝術類社會科學類科學教育類，5，98。

紀妙幸（2003）。隔代教養祖父母健康狀況與生活滿意相關研究。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文化大學。

梁雅舒（2003）。祖父母的孩子－隔代教養家庭輔導。學生輔導，88，34-41。

陳麗欣、翁福元、許維素、林志忠（2000）。我國隔代教養家庭現況之分析（上）。成人教育通訊，4，5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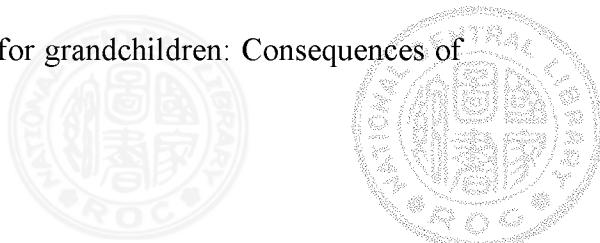
陳貞妃（2002）。祖父母對親職教育需求與參與意願之研究。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嘉義大學。

張耐（2002）。老少配祖孫情。師友月刊，422，4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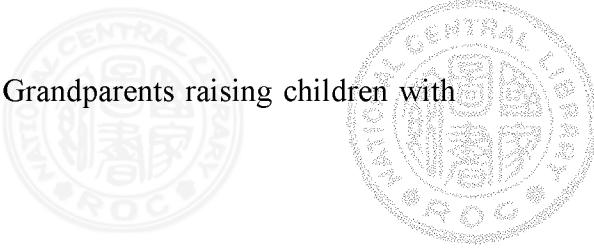
蘇嘉芸（2006）。跳躍生命的空缺：從孫子女觀點探討隔代教養家庭優勢。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 二、英文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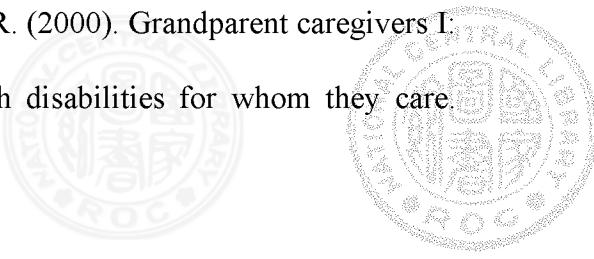
Bowers, B. & Myers, B. (1999). Grandparents providing care for grandchildren: Consequences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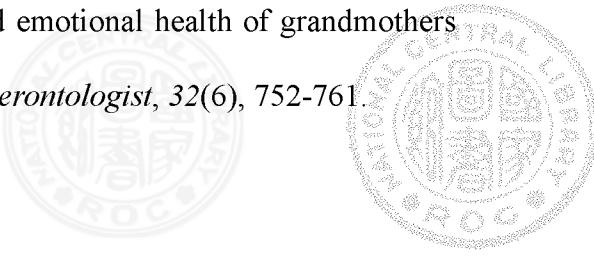
- various levels of caregiving. *Family Relations*, 48(3), 303-311.
- Brown-Standridge, M. D. & Floyd, C. W. (2000). Healing bittersweet legacies: Revisiting contextual family therapy for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crisi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6(2), 185-197.
- Burnette, D. (1997).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he inner city. *Families in Society*, 78(5), 489-499.
- Burnette, D. (2000). Latino grandparents rearing grand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Effects on depressive symptomology.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33(3), 1-16.
- Burton, L. M. (1992). Black grandparents rearing children of drug-addicted parents: Stressors, outcomes and social service needs. *The Gerontologist*, 32(6), 744-751.
- Burton, L. M., Dilworth-Anderson, P. & Merriwether-deVries, C. (1995). Context and surrogate parenting among contemporary grandparents.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30(3/4), 349-366.
- Butler, S. S., Turner, W., Kaye, L. W., Ruffin, L. & Downey, R. (2005). Depression and caregiver burden among rural elder caregiver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46(1), 47-63.
- Chadiha, L. A., Adams, P., Biegel, D. E., Auslander, W. & Gutierrez, L. (2004). Empoweri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formal caregivers: A literature synthesis and practice strategies. *Social Work*, 49(1), 97-108.
- Cox, C. B. (2003). Designing interventions for grandparent caregivers: The need for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practice. *Families in Society*, 84(1), 127-134.
- Fitzpatrick, M. & Reeve, P. (2003).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A new class of disadvantaged Australians. *Family Matters*, 66, 54-57.
- Folkman, S., Lazarus, R., Dunkel-Schetter, C., Delongis, A. & Gruen, R. (1986). Dynamics of a stressful encounter: Cognitive appraisal, coping and encounter outco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5), 992-1003.
- Force, L. T., Botsford, A., Pisano, P. A. & Holbert, A. (2000). Grandparents raising children with



- and without a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Preliminary comparison.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33(4), 5-21.
- Fuller-Thomson, E., Minkler, M., Driver, D. (1997). A profile of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erontologist*, 37(3), 406-411.
- Glass, J. C. & Huneycutt, T. L. (2002). Grandparents parenting grandchildren: Extent of situation, issues involved a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8, 139-161.
- Grant, R. (2000). The special needs of children in kinship care.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33(3), 17-33.
- Gibson, P. A. (2002). Caregiving role affects family relationships of African American grandmothers as new mothers again: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8(3), 341-353.
- Gibson, P. A. (2002). African American grandmothers as caregivers: Answering the call to help their grandchildren. *Families in Society*, 83(1), 35-43.
- Gibson, P. A. (2005).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rican American grandmothers. *Family Relations*, 54, 280-297.
- Goodman, C. & Silverstein, M. (2002). Grandmothers raising grandchildren: Family structure and well-being in culturally diverse families. *The Gerontologist*, 42(5), 676-689.
- Grant, R. (2000). The special needs of children in kinship care.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33(3), 17-33.
- Grinstead, L., Leder, S., Jensen, S & Bond, L. (2002).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health of caregiving grandparent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44(3), 318-326.
- Hayslip, B and Kaminski, P.L. (2005). Grandparents raising their grandchildre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suggestions for practice. *The Gerontologist*. 45(2), 262-269.
- Janicki, M. P. , McCallion, P., Grant-Griffin, L. & Kolomer, S. R. (2000). Grandparent caregivers I.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ndparents and the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for whom they care.



-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33(3), 35-55.*
- Jendrek, M. P. (1994). Grandparents who parent their grandchildren: Circumstances and decisions.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34(2), 206-216.*
- Joslin, D. (2009). Custodial grandparent empowerment: Models of practice. *Families in Society, 90(2), 196-204.*
- Kang, S. (2006). Predictors of emotional strain among spouse and adult child caregiver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47(1/2), 107-131.*
- Kelley, S. J., Yorker, B. C., Whitley, D. M. & Sipe, T. A. (2001). A multimodel intervention for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Results of an exploratory study. *Child Welfare, 1, 27-50.*
- Kivnick, H. Q. (1982). Grandparenthood: An overview of meaning and mental health. *The Gerontologist, 22(1), 59-66.*
- Kolomer, S. (2008). Grandparent caregiver.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50(1), 321-344.*
- Kropf, N. P. & Burnette, D. (2003). Grandparents as family caregivers: Lessons for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9, 361-372.*
- Landry-Meyer, L. C. (1999). Research into action: Recommend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grandparent caregivers. *Family Relations, 48(4), 381-389.*
- Lazarus, R. & Folkman, S. (1980). An analysis of coping in a middle-age community sampl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1, 219-239.*
- Lightfoot M. & Rotheram-Borus, M. J. (2004). Predictors of child custody plans for children whose parents are living with AIDS in New York City. *Social Work, 49(3), 461-468.*
- McCallion, P., Janicki, M. P., Grant-Griffin, L. & Kolomer, S. (2000). Grandparent carers II: Service need and service provision issue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33(3), 57-84.*
- Minkler, M., Roe, K. M. & Price, M. (1992).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of grandmother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he crack cocaine epidemic. *The Gerontologist, 32(6), 752-761.*



- Musil, C. M. (2000). Health of grandmothers as caregivers: A ten month follow-up. *Journal of Women & Aging, 12*(1/2), 129-145.
- Pearson, J. L., Hunter, A. G., Ensminger, M. E. & Kellam, S. G. (1990). Black grandmothers in 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s: Diversity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parenting involvement in the Woodlawn Community. *Children Development, 61*, 434-442.
- Poehlmann, J. (2003).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on grandparents raising their very young grandchildren: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and research.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24*(2), 149-173.
- Sands, R. G., Goldberg-Glen, R. & Thornton, P. L. (2005).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positive well-being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45*(4), 65-82.
- Simpson, G. M. (2008). A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of family resources among low income, African American grandmother-caregiver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51*(1/2), 19-41.
- Smithgall, C., Mason, S., Michels, L., LiCalsi, C. & Goerge, R. (2009).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connected: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grandparent caregiver families. *Families in Society, 90*(2), 167-175.
- Weber, J. A. & Waldrop, D. P. (2000).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Family in Transi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33*(2), 27-46.
- Whitbeck, L. B., Hoyt, D. R. & Huck, S. M. (1993). Family relationship history, contemporary parent-grandpar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the grandparent-grandchild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5*, 1025-1035.



#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adult children on grandparents' stress and coping

Kai-Yun Cheng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ih Chie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 Abstract

Raising grandchildren within house-hold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ainstay family types nowadays. What these grandparents are involved is not only nursery but simply a surrogating parents' role. How to deal with the adult children who bear lawful parentship is a big stress to grandparents. These unstable adult children hinder grandparents from parenting their grandchildren, including power struggles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distrust on adult children's ability to parent, intera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wo of them and the unfulfilled emotion to adult childre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over the impac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on stress and coping based on stress and coping theory. The finding reveals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their adult children influence grandchildren a lot, not only the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bu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grandchildren grow up and grandchildren's well-being as well.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 the interventions may be thus ensued as follows: parentship-authority claiming, emotional loss towards adult children resolving, and resources connecting. If the adult children's perspectives can be involved in the future, I believe that the richness and creativity of this topic will be increased. Also,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n working with the families in which grandparents are raising grandchildren will be provided.

**Key words:** grandparents, grandchildren, adult children, parenting, stress and coping theory

